圖：Unsplash/ Tsaiwen Hsu



詩詞賞析

# 焚書坑

羅隱

千載遺蹤一窖塵，
路傍耕者亦傷神。
祖龍算事渾乖角，
將謂詩書活得人。

## 作者介紹

羅隱（公元833年—910年），字昭諫，新城（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新登鎮）人，唐代詩人。生於大和七年（公元833年），大中十三年（公元859年）底至京師，應進士試，歷七年不第。咸通八年（公元867年）乃自編其文為《讒書》，益為統治階級所憎惡，所以羅衮贈詩說：「讒書雖勝一名休。」後來又斷斷續續考了幾年，總共考了十多次，自稱「十二三年就試期」，最終還是鎩羽而歸，史稱「十上不第」。黃巢起義後，避亂隱居九華山，光啟三年（公元887年），55歲時歸鄉依吳越王錢鏐，歷任錢塘令、司勛郎中、給事中等職。公元909年（五代後梁開平三年）去世，享年77歲。

## 創作背景

千年留下的書籍，被燒成一窖灰塵，路旁種田的農民也感到很傷神。

秦始皇的算計真是機靈聰明，以為人們讀書多，就能活得比別人好。

## 詩詞今譯

人類歷史上的專制者各有各的愚民術和御民術，但有一招，是他們都嘗試過的，那就是鉗制思想，管制言論，壟斷文化，推行文字獄。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，獨裁者依然前仆後繼，依然自以為是地享受著「文字獄」的盛宴。關於秦始皇的「焚書坑」，歷史上感嘆的人很多，羅隱這首〈焚書坑〉即是其一。

## 詩詞解讀

這是一首直接歌詠歷史題材，表達作者議論見解的詠史詩。它跳出了一般詠史詩的窠臼，從另一個角度寫秦始皇的「焚書坑儒」，含蓄而有新意。

詩的前兩句以看似平實之筆敘說了詩人所見：當年秦始皇焚書之處歷經千年，已成為歷史陳蹟，除去滿洞穴的塵土外什麼也沒有了，就過路旁的農夫看到這荒涼景象也感到傷心。這兩句既交代了吟詠的歷史事件，又從側面寫出了詩人的感慨，看似「無我」，實則「有我」。試想：歷史上秦始皇焚書的暴行，是一場民族文化的大劫難。許多優秀的書籍被付之一炬，使每一個視書為生命的讀書人念此而心痛，千年之後的羅隱亦不例外。但詩人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沒有直寫自己的感慨，而是借寫自己的所見，借寫他人的感受來表現這種感慨。一個不識詩書的農夫尚且「傷神」，羅隱作為一個讀書人，自然更是感傷至極，這一點，讀者一想即知，不說勝似多說。這種融思想感情於敘事當中、融豐富內容於平實當中的寫法，既簡明經濟，又韻味無窮，不由人不讚嘆詩人運用語言、高度概括的功力。

詩的三四句，寫詩人的議論，揭示秦始皇焚書的原因。「祖龍算事渾乖角，將謂詩書活得人。」意謂秦始皇謀劃事情還真聰明，他認為燒燬書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，贏代政權永存。一般的詠史詩，作者都是從客觀的角度，或讚或貶自己所吟詠的歷史事件及人物，而羅隱卻不是這樣處理的。他是帶著嘲諷的語氣，從揣測秦始皇主觀心態的角度，輕輕一筆寫就的。這裡詩人不用始皇而用「祖龍」，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諷刺意味。據《史記．秦始皇本紀》記載，秦始皇曾對「祖龍」自作解釋說：「祖龍者，人之先也。」他要做諸「龍」之先，然後傳諸子孫萬代。既如此，詩人就用「祖龍」來稱呼他，但實質是僅其意而用之，絕非單純地使用典故。秦始皇為當初採納李斯的奏議，燒燬了他認為是禍亂根源的「百家之言」，主觀上是要推行「以愚黔首」的愚民政策，藉以維護其政治統治，達到傳二世、三世以至萬世之目的。這樣的打算是荒謬的，僅是一廂情願而已。因為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，焚書之後沒幾年，義軍四起，贏氏政權很快就成了一個短命王朝，對於這些與秦始皇主觀設想背道而馳的歷史事實，羅隱是再清楚不過了。但是詩人並沒有像其他後世文人那樣去正面議論，直抒胸臆，猛烈地抨擊譴責秦始皇所為之荒謬，殘暴，而是以較為輕鬆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語氣，通過「渾乖角」這樣的詞語表達自己的揶揄嘲諷之意，不露鋒芒而又鋒利無比，無情地鞭撻了秦始皇焚書的暴行，深刻地諷刺了秦始皇的異想天開，真可謂匠心獨運，曲折達意而又深刻有力。

# 菲爾茲獎背後的教育追問

【文 / 雅清】近日中國籍數學家王虹、鄧煜榮獲國際數學聯盟的菲爾茲獎。菲爾茲獎被視為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，王虹和鄧煜同時獲獎，被許多大陸媒體稱為「中國數學」的歷史性時刻。

這當然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。王虹在調和分析和幾何測度論方向取得重要突破，與合作者解決了三維掛谷猜想；鄧煜則在偏微分方程和數學物理方向作出貢獻。但這場祝賀很快變成了一場複雜的輿論事件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

王虹和鄧煜都曾在北大學習，但他們後來的博士訓練、科研工作和重要突破，主要是在海外完成的。於是，很多人開始追問：我們應該樣看待這份榮譽？到底是「國內教育培養出來的成果」？還是海外學術環境在他們成長中的作用更大？

## 一、榮譽屬於誰？

王虹和鄧煜獲獎後，北大很快通過官網、公眾號等渠道表示祝賀，強調兩人都曾在北大學習。這樣的祝賀本來沒有問題。學生取得世界級成就，母校表達高興和自豪，是人之常情。

但爭議也正是從這裡開始的。很多網友注意到，王虹雖然 2007 年考入北大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，後來轉入數學科學學院，但她之後赴法國、美國繼續深造並完成關鍵研究；鄧煜同年進入北大數學科學學院，後來轉學到麻省理工學院，又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受博士訓練。也就是說，他們和北大有關，這是真的；但他們真正走向世界頂尖研究者的過程中，海外學術環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所以，公眾質疑，北大的祝賀有沒有被說成「我們培養出了菲爾茲獎得主」？如果只突出他們曾經在北大讀書，卻很少提他們後來的海外訓練、導師支持、學術共同體和長期研究環境，就會讓人覺得這份榮譽被過度「蹭領」了。一個科學家的成長不是一兩段履歷就能概括的。更誠實的說法應該是：北大母校給過他們早期訓練，但他們最終在海外更廣闊的學術環境中成長為世界級數學家，

## 二、鄧煜談海外經歷為什麼會被刪？

鄧煜專訪中的一段內容也引發了爭議。有報導提到，他在談到年輕學者是否應該出國深造時，說選擇要看具體條件、學術環境和個人方向，如果條件允許，感受一段海外學術生態，對一個研究者的長期成長是有價值的。

但這部分相關問答在某些轉載版本中被刪掉了。「刪」，反而讓事情變得敏感。因為如果一段關於海外學術環境的正常討論都要被避開，公眾就會懷疑：是不是有人擔心它沖淡「國內培養成功」的敘事？是不是承認海外科研環境的重要性，就會讓榮譽認領變得不那麼完整？

其實，出國深造本身不應該是一個難以啟齒的話題。現代科學本來就是全球性的，優秀學者在不同國家、不同學校、不同學術共同體之間流動，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一個健康的教育系統，不能因為學生後來去了更合適的環境而感到尷尬，相反，它應該為學生能夠進入更廣闊的學術世界而高興。

## 三、王虹的「灰心」一詞被屏蔽

王虹對自己求學經歷的回顧時表示，她並不是傳統意義上一路被競賽光環包圍的天才。她從廣西考入北大，最初不在數學系，後來轉入數學科學學院。在高手雲集的環境裡，她曾經感到吃力、掙扎，甚至覺得自己像一個「小透明」，這和許多人想像中的「天才一路開掛」並不一樣。

後來，王虹在海外繼續學習和研究，遇到更適合自己的導師，更好的節奏和學術環境。她曾提到數學很難，也曾有過轉向建築的念頭，但最終還是回到數學，這些誠懇的話表達出，她也曾有過灰心的狀態，曾需要被耐心傾聽和鼓勵。

雖然對於她曾經感到 discouraged（「灰心」「受挫」）的表述，很多讀者產生共鳴。「灰心」這個詞本身還是被各大平臺屏蔽了。彷彿它打破了一個完美敘事。因為習慣上中共官方宣傳喜歡講順滑的版本：「某某人才被發現和培養，一路受到各方支持，最後為母校和國家爭光。」可真實人生哪有一個模版？真實的人會迷茫，會受挫，也會在某個環境裡不適應。一個真正有自信的教育系統，應該聽得進這些真實感受，而不是只允許成功者講感謝，不允許他們講痛苦。

中國教育體制太習慣用統一標準識別人，看重分數高，排名靠前。但有些有創造力的人未必一開始就很突出。有的人節奏慢，興趣窄，表達不強，甚至看起來有點不合群。如果教育系統只會獎勵最顯眼的人，就可能錯過那些需要更長時間才能突顯成績的人。如此，教育體系就會變成篩人的能力很強，培養人的能力卻很弱。

## 四、基礎研究和績效化管理

這些年，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常見的關鍵詞有「非升即走」、「論文」、「基金」、「帽子」、「項目和 KPI」等。年輕學者要在三年之內證明自己「有產出」，否則就可能面臨離開。學術研究在這種制度下，很容易變成一場內卷。

可王虹研究的掛谷猜想、鄧煜推進的希爾伯特第六問題，並非靠短期衝刺就能解決的課題。它們需要長期沉浸、反覆失敗、持續積累，也需要一個允許研究者在相當長時間裏沒有可量化成果的環境。

海外研究機構當然也有競爭，但在一些頂尖基礎研究環境裡，學術自主、長期支持和容錯空間更受重視。導師可以耐心聽一個年輕人的不成熟想法，機構可以給研究者更多時間去鑽研真正困難的問題，學術共同體也更強調開放交流。顯然，這些條件更有利於原創性慢慢生長。

相反，如果學術被行政指標牽著走，研究者就會被迫追求更安全、更短平快的方向。論文像產品，基金像訂單，引用率像績效。久而久之，學術研究越來越功利，長期性的和風險高的問題反而沒人敢碰。

古人說，「生於淮南則為橘，生於淮北則為枳。」人才也是如此。天賦固然重要，但天賦能不能施展，取決於它落在什麼樣的土壤裡。一個鼓勵自由探索、允許失敗、尊重長期積累的環境，可能讓原本不顯眼的人慢慢長成；而一個只看指標、只要服從、只求短期成果的環境，也可能把最有潛力的人提前消耗。

## 人才需要怎樣的教育和科研土壤？

這場菲爾茲獎慶祝背後，真正值得反思的是：中國的科研領域有無只重視指標，不重視長期探索的傾向？宣傳是否只願意歌頌成功，不願意觸碰人成長過程中的挫敗？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麼？人不該被設計成統一模具，也不能把天才做成宣傳樣板。教育應該讓各類人才都有機會慢慢發揮特長。只有當學校願意給學生更多耐心，科研機構願意給學者更多自由，社會願意承認人才成長的複雜性，我們才可能擁有不斷孕育創造力的土壤。